

Yuqing Yu Shehui Fazhan Luntan (2014) Lunwenji

舆情与社会发展论坛 (2014) 论文集

主 编 / 芮必峰

执行主编 / 刘 勇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本书得到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以及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项出版基金资助

Yuqing Yu Shehui Fazhan Luntan (2014) Lunwenji

舆情与社会发展论坛 (2014) 论文集

主 编 / 芮必峰

执行主编 / 刘 勇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輿情与社会发展论坛 (2014) 论文集/芮必峰主编.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650-2729-1

I. ①輿… II. ①芮… III. ①輿论—中国—文集②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C912.63-53②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4491 号

輿情与社会发展论坛 (2014) 论文集

芮必峰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慧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人文编辑部: 0551-62903205	印 张	18.75
	市场营销部: 0551-62903198	字 数	321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昶颜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729-1

定价: 4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舆情与社会发展论坛(2014)论文集》

编 委 会

主 编 芮必峰

执行主编 刘 勇

编委会成员 姜 红 黄伟迪

杨 扬 李小军

周 彤 曹丹丹

总 序

芮必峰^①

当下中国的舆情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期间我们所做的研究是怎样的,以及我们的舆情研究还存在哪方面的问题,我想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这既是我对当下中国舆情研究的几点思考,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以此激发后续的讨论。我这里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想提出来请教各位专家和在座的同学。

先谈第一个问题。大概近五年来,几乎每一所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有舆情研究或设立舆情所,舆论问题何以成为当今的热点问题?实际上在这之前,舆论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西方的“舆论”和中国翻译过来的汉语“舆论”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也了解舆人之情、舆人之论,但是那样的了解是为了统治、得民心,为了统治者更受人爱戴。而今天的这个“舆论”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我认为,大致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利益开始多元。在过去,实际上只有几本舆论书,其中有几本是翻译过来的,还有几本是拼拼凑凑的。没有像今天这样大规模地、细致地,尤其是定量地分析。过去,利益是一元化的,一元化的利益造成了对这些方面不十分关注。第二,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以后,中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壮大。他们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这部分人力量的壮大带动了社会其他方面力量的崛起。第三,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些变化,加上这些矛盾,各种利益诉求和观点针对社会上的矛盾就要有一个表达的渠道。第四,在这三个前提下,恰恰新媒体开始在中国普及。它的普及也就十来年的时间,而西方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兴起,到我们中国就更晚了。这四个条件综合到一起,舆论就受到人们的关注,舆论

^① 作者系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江淮学院院长。

开始成为问题。随着这四个条件的转换,我们的舆论研究和舆论变化,可能还会出现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不一样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舆论、舆情、民意等,我们到底怎样看待这些概念,或者说我们现在研究的到底是什么,绝大多数的研究报告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认为,它研究的不是舆论,而是民间的情绪。这种研究有点类似于下述情况:两个人在发生观点争论,我们没有研究这两个人的观点在谈些什么,而是研究旁边的起哄者,看起哄的人谁声音大,占多大的比例。这样来说,我们到底是在研究舆人之情即舆人的情绪,还是舆人之论?如果要研究舆人之情,该怎么研究?这个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无非是谁的嗓门大一些,无非是哪边的人多一些。嗓门大、说的人多,自然它能产生压力,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现在究竟在研究什么,舆情是否代表民意,这些问题,我认为还有思考的必要。这里不是死抠概念,我不清楚包括我们现在的舆情中心到底是在研究什么。我看到的一些报告,基本上是民间情绪,我们通过电话访谈,问受访者怎么看,然后比例出来,是怎样的情况;最多,加一点所谓的原因分析。这完全是研究民间情绪,我们似乎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舆论研究的程度,更不要说在舆论研究中上升到民意的推断。

第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舆情研究?我现在有个担忧,也许这样说不合时宜,当然,高校的应用学科要为社会服务,但是高校为社会服务,到底怎么服务?我发现现在多数的舆情研究或者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充当“绍兴师爷”的角色——摇摇扇子,帮主子出谋划策。这是不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主要功能,我们到底应该充当现代化军队里的“参谋长”,还是当古代社会的“绍兴师爷”?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研究一头倒在行政研究上,缺少批判研究;正是存在这样的原因,我们现在的研究一头倒在实证研究上,而在实证研究上,更重要的是倒在量化研究上。现在的质化研究少,量化研究多,凡是转化成数量的东西,基本上取得的是最大的交换值。它把事物最丰富的内涵全部掏空,给你一个简单的数据,其实这数据后面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没有去关照。没有质化研究,更别说在量化和质化基础上的批判研究。因此,现在得到的大量数据和报告,却没有人沉下心来对它们去做更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些流传下来的社会科学的著作。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整个舆情或者舆论研究是重描述轻规范。描述解决“是什么”问题,这当然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问题上还远不够。在这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是这样,还可能有什么样态,应该怎么样等,在“描述”的基础上还需加强“规范”。只有在了解

了这些情况后,才对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更大意义。

这四个问题,也正是我在主持我们的研究所工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在感受和思考的问题。我的这些问题也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是为序。

[本文系芮必峰教授在“舆情与社会发展论坛”(2013)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

目 录

动员与撕裂：城市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

- 以香港“占领中环”运动为例 周春霞 (001)

应急广播危机传播研究

- 以汶川、雅安、景谷三次地震中的应急广播为例
..... 童 云 (008)

“集体喝农药”事件背后的抗争逻辑生成机制研究 高 涛 (025)

污名化：“城管”的媒介话语建构

- 基于20家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实证研究（2000—2013）
..... 张 洋 (036)

信息流瀑：群体极化下的网、媒互动

- 以“4·15 香港幼童便溺”事件为个案的研究
..... 周 洲 (054)

网民“怒潮”的兴起与消减特征

- 以新浪微博上关于“平度事件”的言论为例 郝丽婷 (062)

网络政治参与可操纵性刍议 郑兴刚 (072)

微博时代“民意”与“民主”的认识误区评析 祝璇璇 (082)

“五个一工程”涉藏获奖作品中的西藏形象传播 李凌达 (094)

新媒体语境下武汉城市形象传播探析 钟芳娜 (116)

寻找西藏传播能力建设的突破口

- 从《中国西藏》（中文版）杂志内容分析看西藏区域
形象建构 孙鹿童 (131)

健康传播视域下的理疗仪群体

- 基于理疗仪体验店田野调查的思考 白洪潭 (141)

浅谈区域警务微博话语权建构

- 以安徽省公安厅官方微博为例 庄 睿 (150)

外省市来京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 曾祥明 (159)

网络议政的群体传播及社会治理刍议

- 周 琼 (172)

作为象征的“爱城主义”

- 符号学图景下的合肥城市口号变迁研究 薛明玉 (187)

城市的空间生产及媒介构建中的文化认同危机

- 以“历史文化名城”太原为例 王 晶 (199)

转型期社会的多元媒介表达与舆论引导

- 以城镇化相关舆论为例 周 彤 (212)

从“小隐于村”到“中隐于市”(上)

- 传播视野中的合肥艺术家村打造与农村城镇化
..... 刘高见 (228)

从“小隐于村”到“中隐于市”(下)

- 传播视野中的合肥艺术街区创设与城中村改造
..... 王文俊 (239)

从个体化走向共同体：微博民间舆论场研究

- 黄盛泉 (256)

从“有无相生”到“多元共生”

- 作为“场所媒介”的江南水乡灰空间研究 陶文静 (270)

编后记

- 刘 勇 (286)

动员与撕裂：城市社会运动中的社交媒体

——以香港“占领中环”运动为例

周春霞

摘要：运用“社会运动”相关理论，针对当前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中的媒介表现，着重分析社交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作用。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在“街头社会运动”中是必要而有效的方式，一方面起到了动员和资源组织的效果，提升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机遇；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形成“媒体循环”，加速了政治精英的分化，导致社会运动政治机遇的僵局。

关键词：社交媒体；社会运动；政治机遇结构；占领中环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关于社会运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指出：“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为了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进行集体的、有目的的行动。伴随而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社会运动。”这次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无论定性为社会运动还是西方媒体话语中的“雨伞革命”，这场因政改所激发的集体抗争运动不但在香港的街头上演，更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交织作用下急速扩散其影响。

尤其是人们很容易把此次社会运动中最为活跃的社交媒体（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香港高登论坛等）所扮演的角色与早前的“阿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AHSKQ2014D108）。

作者简介：周春霞，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拉伯之春” (Arab Spring) 相比, 认为尤其在人力动员、物资调配及唤起国际关注等层面, 有助于将运动在各个社会阶层扩散开来, 提升社会动员的效果。但这些对社交媒体积极功能的评价可能只是现实的一部分而已, 事实上我们同时观察到社交媒体在社会民意的聚集上带来了比街头冲突还要大的矛盾和分化。因此, 笔者的目标是探究此次运动中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作用是什么, 它们能够实现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而非像“占中运动”的参与者运用社交媒体自我宣称的目标是什么。

二、政治机遇结构视角下的“占中运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网络尤其是新兴的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研究领域, 出现了多种分析框架,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源动员理论 (Resources Mobilization Theory)、政治机遇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以及框架过程 (Framing Process) (裴宜理、阎小骏, 2006; 赵鼎新, 2006a, 2006b; 莫里斯、缪勒主编, 2002)^①。

传播学者早就注意到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 但大多是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脉络切入, 强调的是社会运动参与者能够动员社交媒体作为抗争的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 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能够有效地将不满情绪转化为成功的政治行动。

实际上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大多认为政治机遇结构的出现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或兴起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样的结构变迁有助于社会运动的成功。泰罗 (Tarrow) 把政治机遇结构的组成要素归纳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 政治管道的存在。既有的政治局势越是提供人民参与决定的空间, 机会则越开放。第二, 不稳定的政治联盟。政治局势越是动荡, 越能够提供挑战者运作的空间。第三, 有影响力的盟友。社会运动需要外来资源的汇入, 政治盟友的出现有助于运动的动员。第四, 精英的分裂。如果执政党无法

^① 赵鼎新, 2006a,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b,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 框架与反思》, 《学海》第 2 期。莫里斯, 艾尔东、卡洛尔·麦克拉克吉·缪勒主编, 2002, 《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刘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裴宜理、阎小骏, 2006,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 4 期。

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回应外在要求，即是为挑战者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①。

在中国语境下，政治机遇结构在社会抗争中也不容忽视，政治机遇结构“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因素”^②。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的作用在拓展了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带来新的政治机会。

政治机遇结构影响社会运动的策略选择。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中，“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政治磨合过程，其艰巨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海内外的中国人包括香港人的想象。一方面：“今天的香港，继续坚守法治，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市民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结社、集会，以及所有‘基本法’所规定的其他自由和权利”^③。这一点我们从“九七”香港回归以后，集会、游行、示威的密度和规模，一点也没有比香港回归以前减少或减小可以看出。香港相对于内地开放的政治管道提供了各类社会组织政治表达的空间，从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到2012年的“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运动”，基本上采取的是“融入性策略”（assimilative strategies），如游说、请愿、组团参与选举竞争、向法庭提起诉讼等。连续不断并且卓有成效的社会运动为今天更具有“杀伤力”的“占领中环”运动累积了政治表达的经验。然而，面对2017年特首直选和2020年立法会直选等政治性议题，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过程不允许广泛的政治参与，政策实施的策略也非常有力，这使得香港本土不同意见的抗争者在立法会内部采取融入性策略来抗争无效后决定采取“对抗性策略”（confrontational strategies）——“占领中环”。

政治机遇结构同样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果。在“一国两制”政体下，当中央政府给予香港政府更为开放和自由的施政环境时，社会运动的抗争者有可能从制度的渠道获得参与政策变革的政治机遇，社会运动可能会取得实质性效果，达到社会运动的目的。例如2012年的“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运动”，泛民主派组成“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展开多次的抗议活动，例如街站、联署、游行、集会及绝食等，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德育

① Tarrow, Sidney. State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s. Doug McAdam, John McCarthy & Mayer N. Za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1-61.

② 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4，（4）。

③ 董建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群策群力，转危为机[EB/OL]. <http://sc.info.gov.hk/gb/www.policyaddress.gov.hk/pa98/chinese/speech.htm>, 1998-10-07.

及国民教育科。而香港政府最终宣布搁置计划。但在普选议题中，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均表现出封闭性的强硬的态度，这导致抗争最可能的结果是政治僵局，新旧政策都不可能成功实施，这样就会带来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压力”（structural impacts）。

三、社交媒体助推“占中运动”政治机遇的改变

面对既有的政治机遇，“占中运动”的发起人对政治机遇的感知，要比外部力量强弱等因素更能决定社会运动的成败。早在2013年1月，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题投稿《信报》，提出“以往的运动抗争方式在争取普选此重大关键议题上效用成疑，因此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①，就是“占领中环”。自此之后，引来政界、社运界以及网民各方的讨论，包括计划是否可行及实际操作方法。从2013年的1月提出“占中”到2014年9月28日凌晨1点40分，戴耀廷宣布“占中”正式开始，在长达1年8个月的运动发酵期，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运动发起人和参与者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的平台，搭建抗争网络，有意识地寻找外部盟友，将一切可以团结起来的力量纳入运动中，为政治机会的创造积累资源，企图改变原先的政治机会结构，从而为下一步的行动创造机会。

（一）动员：寻找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盟友”

在互联网时代，香港社会运动的发起者早就学会通过网络空间学习国际社会运动的经验，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运动态势。在占中运动启动后，由于担心香港政府切断网络，自9月28日午后的24小时内，FireChat软件（一款可安装在手机的应用软件，可以在断网的状态下实现联网）在香港多了10万用户，使用人数在28日夜间达到高峰，有3万多名用户同时使用，不断地向周围的人发送“占中运动”的最新消息^②。

一方面“占中运动”的参与者在占领街道和公共广场向香港市民散发传单、搭建临时演讲台、进行热情讨论，在街头举办嘉年华会式的集会；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同时向全世界的听众广泛发出信息，寻找盟友，有意

① 资料来源：<http://www.msn.com/zh-hk/news>

② 资料来源：<http://www.ibtimes.com.cn/trad/articles/39406/20140929/705221.htm>

思的是这种经由社交媒体发出的盟友寻找让人们相信“不是政客与政客之间的，也不是伟人与伟人之间的，而是公民对公民、个人对个人的”^①。无论是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 Facebook 公共页面上点 Like 的 9 万多人，还是在“帮港出声”页面上点 Like 的 9 万多人，都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是黄秋生还是王晶，作为香港的公众人物，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表明他们的态度时，都让社交媒体掀起更加热烈的讨论和争议，人们为各自找到的有影响力的盟友而欢呼。

社交媒体正在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在 Facebook 上，有关占中的专页约有 13 个，有关“反占中”的专页也有至少 8 个，而召集群众参与“占中”和“反占中”的群组更是不断涌现出来。而学民思潮领导人黄之锋除了个人主页之外，还开设了 3 个交流组来讨论交流有关运动的资讯，而 Twitter 上关于占中的信息也多达千条以上。

由网友个人制作而非运动的组织制作的“占领中环”的主题曲《问谁未发声》最早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 Facebook 专页传出，在社交媒体上即迅速传播，新版 MV 上载 YouTube 四日就有十多万的点击，包括《相约中环》《占中报佳音》《港府与城墙》等一批改变歌曲在社交媒体的上传和下载，实现了社会运动的情感动员。

在社交媒体上，信息的及时沟通和对警察运用暴力的细致描述，不仅吸引了许多同情者参与到运动中来，而且还影响到国际主流媒体对“占中运动”的报道，这为社会运动寻找到更为广泛的盟友。通过建立广泛的有影响力的盟友，社会运动的组织寻求和政府内部协商对话的机遇。

如果我们仅仅看社交媒体中支持“占中运动”的一方，我们可能会肯定社交媒体的动员效果。正如学者林奇（Lynch, 2011）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社交媒体在推动社会运动上具有四种动员的效果：一是社交媒体让对政府不满的民众拥有了发生和协同的渠道；二是社会运动组织者可以通过社交网站发送大量鼓励性的信息；三是社交媒体让当权者付出平息运动的代价提高；四是运动组织者透过社交媒体提升了社会运动国际的认可度^②。但是，当我们把视线转向社会运动支持与反对两派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时，社交媒体的正向效果可能有待商榷。

① Lev Grossman,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You”, Time, 13 December, 2006.

② Mare Lynch, 《阿拉伯起义》，资料来源：www.cnsunlight.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3001

(二) 撕裂：社交媒体上“精英的分化”

在香港政府内部，关于普选的议题也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仅仅为一大概分类，并不代表同一派别议员在普选的议题上态度一致。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特征让“占中”发起人和“反占中”人士分享政见，通过网络投票，点赞等方式不断巩固己方的阵营。在作为发声平台的 Facebook 上，两派内部的建制派的民建联、工联会和自由党，泛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等多个政党和政治派别成员，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声音，导致官方的同盟也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例如属于泛民主派阵营的黄洋达尽管在政治观点上支持普选，但他认为由离地的中产带头，只是沿用以往“快乐抗争”一类手段，毫无杀伤力，只会以闹剧形式终结，最终损害港人争取民主的士气。在他旗下的《热血时报》的 Facebook 里将活动揶揄为“占领光环”，进行一系列反对的宣传^①。在占中运动的发酵期，各种政治取向的社会精英纷纷在社交媒体中进行意见交锋，不断上演舆论谴责、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等剧目。经由社交媒体建构的议题，不断把香港的社会精英特别是拥有较多政治资源的精英卷入这场关于“占中运动”的大讨论中，为“占中运动”的启动创造了政治机会。

在社交媒体碎片化、情绪化的表达之外，传统媒体也未失声，在与“占中运动”相关的各个 Facebook 专页中，我们随处可见粘贴的来自报纸的新闻稿、图片以及电视媒体的视频。而传统媒体的报道中引用来自社交媒体的话题更不少见。以“占中运动”报道中非常活跃的《苹果日报》为例，以“占中”和“Facebook”为关键词搜索其新闻网页，约有 59000 条新闻，这些新闻大多提到消息源来自相关 Facebook 的信息。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相互引用彼此报道的内容，形成了一个“媒体循环”、协同作用，带来了更为迅速的社会群体的意见分化，占中运动的各方陷入僵持状态，政治机遇结构陷入僵局。

四、结 论

本研究通过对香港占中事件的分析，细致探讨社交媒体对于政治抗争事件中政治机遇的影响。现有的社会运动研究大多从资源动员、抗争策

^① 资料来源：黄洋达主页，<https://www.facebook.com/#!/wytat?fref=ts>

略、行动扩散等角度探讨新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本研究将政治机遇结构理论运用到占中事件的分析中，归纳出适合香港政治语境的解释框架。在将 Tarrow (1996) 提出的操作性分析框架与香港现实综合分析后，我们发现，社交媒体一方面由社会运动的发起人自发地用于进行大范围的运动动员和宣传为运动，寻求“有影响力的盟友”，通过将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纳入行动网络中，创造政治机会。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构成的“传媒循环”，带来了政治精英的分化以及更为广泛的香港社会群体分化，导致占中运动陷入政治机遇的僵局。

参考文献：

- [1] 蒂利，查尔斯、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 [M]．李义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2]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述评 [J]．《社会学研究》2011，(2)．
- [3] 莫里斯，艾尔东、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M]．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4] 倪云鸽，胡雨．《试析当代政治伊斯兰的生成机制——一种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宁夏社会科学》，2009，(4)．
- [5] 裴宜理，阎小骏．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 [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 [6] 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J]．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7] 张维为．浪漫“革命”之后：埃及困境如何破解 [J]．社会观察，2011，(3)．
- [8]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9]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 [J]．学海，2006，(2)．

应急广播危机传播研究

——以汶川、雅安、景谷三次地震中的应急广播为例

童 云

摘 要：非典、汶川地震对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水平提出新的考验和要求，建立国家应急广播被提上议事日程。2011 年安徽成立第一个省级应急广播，2013 年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成立，2015 年年底我国将基本完成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建立灾前预警、信息发布、抢险救援、灾后修复重建的统一调度指挥平台，这将成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载体和互动渠道。文章以雅安、芦山、景谷等地震中的应急广播为例，对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技术保障、层级架构、社会联动、社会功能及其目前存在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政府危机管理和媒体危机传播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应急广播；危机传播；架构；功能；机制

一、引 言

自然灾害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因发生突然、危害范围大、受灾人群数量多等因素，成为威胁人类社会的“天敌”。民政部、国家减灾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对 2014 年前三季度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会商分析核定，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24521.9 万人次受灾，606.7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269.2 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42.4 万间房屋倒塌，300.9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24899.3 千公顷，其中绝收 2853.9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3182.6 亿元。前三季度我国自然灾害以干旱、洪涝、台风、地震灾害为主，风雹、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风暴潮、生物灾害

作者简介：童云，安徽大学輿情与区域形象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